

從價值觀邁向幸福感的十字路口： 運用多層次模型探討個體價值、文化價值與 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林義宏¹ 許義忠^{2,*} 吳美華³
何夢玲³ 陳端容⁴

目標：主觀幸福感的預測因子具文化差異，本文由價值觀切入，探討個體之個人自主性與社會共融性對幸福感的效果如何受文化調節。**方法：**整併第六波《世界價值觀調查》與Hofstede文化向度等資料庫，運用多層次模型分析31國、共40,195筆資料，並視覺化呈現自主性與共融性的效果如何隨不同文化向度而變動。**結果：**自主性與共融性對幸福感皆有正向效果，且兩者效果皆有顯著跨國變異，其中共融性的效益較穩定。跨層次交互作用分析結果不支持「價值觀同化效益」，而是支持「價值觀互補效益」假設：當一國文化愈偏向集體主義、注重約束性規範、權威與服從，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反而增強；而在強放任主義文化國家，自主性甚至出現負向效果。**結論：**當個體能夠不被主流文化過度同化，而是發展出異於群體文化價值的傾向，反而可能增進幸福感。故推動相關政策時宜將個體價值觀與文化脈絡納入考量，鼓勵人們了解自身文化所注重與忽略處，兼容學習不同於群體主流的價值觀。（台灣衛誌 2024；43(3)：280-299）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價值觀、文化向度、多層次模型

前 言

過去半世紀以來，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逐漸成為心理、經濟、政治、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熱門研究議題[1-3]。主觀幸福感指一個人對於自身生活狀態的主觀評估[1]，與免疫功能[4]、晚年健康[5]、預期壽命[6]等健康結果有正向關聯，世界衛生組織現已將其列為健康促進辭

彙表（Health Promotion Glossary）核心辭彙[7]。從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正因在定義與測量上注重「主觀性」，學者認為主觀幸福感有別於國內生產毛額、識字率、平均壽命等客觀數據，可視為衡量社會福祉的另類指標，是公共政策制訂者的重要參考依據[8,9]。基於主觀幸福感的個人與公共價值，歷來研究十分關注其預測因子，但證據指出主觀幸福感的預測因子並非普世皆然，而是存在文化差異[10-13]。循此觀點，本研究欲以價值觀（value）為主軸，探討個體價值、文化價值的交相互動可能如何影響一個人的主觀幸福感。

根據跨文化心理學觀點，文化是一組群體共享的態度、信念、規範、價值[14]，而每個人作為文化性的存有，雖因與他人共同生活於社群中，使得深層的自我、心理、行為傾向漸漸耳濡目染[15]，同時卻也擁有彼此互異的價值觀，兩個層次不可彼此化約[16,17]。那麼，一個人應該內化群體主流的文化價值觀，較有利於生活福祉；還是發展

¹ 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

³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⁴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 通訊作者：許義忠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E-mail: hsuyichung@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24年4月1日

接受日期：2024年6月24日

[http://doi.org/10.6288/TJPH.202406_43\(3\).113022](http://doi.org/10.6288/TJPH.202406_43(3).113022)



出異於群體主流的價值，也就是不被群體文化過度同化，反倒才對幸福感有所助益？目前鮮少有文獻直接探討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之間的搭配關係，本研究則由此切入，探討個人自主性（agency；下簡稱自主性）與社會共融性（communion；下簡稱共融性）對於主觀幸福感的預測效果，如何受到跨國性的文化差異調節。

「個人自主－社會共融」的權衡：從個體差異到文化差異

人是社會的動物，時時需要面臨自我與他人之間的折衝協調，在滿足一己需求、追求自我實現、尋求獨立自主的同時，又必須留意他人感受、建立人際關係、融入社群、服膺社會規範[18,19]。如何在「自主性」與「共融性」的張力中取得平衡，可謂為人類社會生活共通的主旋律[20]。從個體層次來看，人們對自主性與共融性重視程度不同，形成價值觀的個體差異[21,22]。國家層次而言，社會群體對自主性與共融性的偏重型態不一，則構成文化價值的跨國差異[14,23-27]。

過去文獻將個體的價值觀分為自主性與共融性兩軸，前者反映自我聚焦、成就導向的心態，後者則是關懷他者、重視社群與人際關係的傾向[21,22]。根據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觀點，「追求獨立自主」與「融入周遭社群」皆為人類重要且基本的社會心理需求[21]。因此就個體層次而言，這兩種傾向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關係，而是受到環境、關係、個人選擇等共同前因所影響，從而共同消長的相關面向[28,29]。也正因自主性與共融性各自呼應不同的社會心理需求，故對於個體生活福祉都相當重要，過去研究指出兩者對於提升幸福感皆有正向效果，甚至缺一不可[30-32]，但既有文獻多限於美國樣本，本研究則欲以跨國資料分析檢驗自主性與共融性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效果。基於兩者之於人類社會心理需求的重要性，本研究仍依循過去研究發現，假設自主性與共融性對於幸福感皆有獨立的正向效果，而我們更進一步採取跨國比較觀點，認為自主性與共融性的效果存在跨國差異，且可能透過文化差異來解釋。

在國家層次，心理學家Geert Hofstede提出六個文化向度（cultural dimension）捕

捉世界各國森然多樣的文化特徵[23-25]。其中，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放任與約束（indulgence vs. restraint；以下稱放任主義）以及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三個文化向度，都涉及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拮抗或調和關係。在個人主義文化下，人們傾向將彼此視為獨立個體，把個人目標放在他人和群體目標之前，較注重自身需求、權益與想法；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下，人們傾向將彼此視為社會關係或群體的一分子，更願意優先考慮群體目標，注重社會倫理規範，偏好人際關係的維繫與和諧[14,24,26]。其次，放任主義代表一個社會或文化容許人們投入享樂活動、滿足個人慾望的程度，該向度的另一端，則強調社會規範以及對個人自由的限制[24,33]。最後，權力距離關乎人們對於權力不平等的感知與接受程度，在高權力距離文化下，人們傾向接受垂直式的權力結構，習慣服從掌權者的意向與決策，也較不敢表示反對意見[23-25]。

本研究將「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視為注重個人獨立自主價值的文化向度，對應個體層次的「自主性」價值觀。「權力距離」則代表注重群體歸屬、社會關係的文化向度，對應個體層次的「共融性」價值觀。如果一個人發展出的價值觀與國家群體的文化價值相符，抑或者出現分歧，將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什麼效果？本研究針對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的交互作用，提出兩組競爭性研究假設（competitive hypothesis）：「價值觀同化效益」與「價值觀互補效益」，並運用大型跨國資料庫的多層次分析對兩組假設進行檢驗。

文化－個體的價值觀同化效益

當個體內在的價值信念與社群共享文化互相契合，常可發揮如魚得水的加乘效應，帶來較多正面情緒、較高自尊與幸福感、較佳工作表現，甚至更長壽等多種益處[34-42]。這樣的研究觀點過去被稱為「個體－文化適配」（person-culture fit/match），本研究則稱作「價值觀同化效益」，反映個體在特定文化脈絡中長期浸淫，以致於深層心理結構與群體文化趨同[15]，發展出與之相似的價值觀，從而可能有助增加幸福感的現象。

多份大型調查研究指出，當個體的政治傾向[37]、宗教信仰[39]、人格特質[34,38]與生活周遭的地理或文化區域之群體成員相似，往往會伴隨更佳的身心福祉，如自尊與幸福感較高、壽命較長等等。進一步分析背後歷程，當個體的價值觀與群體文化主流相符，可能發揮社會潤滑劑的效果，推動日常社會互動順暢進行[42]，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友誼精神[43]，乃至於強化集體認同與國家驕傲感[36]。而當個體價值觀與群體文化相左，可能不利於社會關係的經營與維繫，進而減損幸福感[44]。換言之，當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相互呼應，可能透過改善人際關係與互動品質、提升集體認同等心理行為機制增進幸福感，反之，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的衝突則可能引起實際的人際衝突或認同矛盾，繼而不利身心適應。循此思路，當個體具備愈高的自主性價值，同時又生活在強調個人主義、放任主義的文化，就可能為其帶來愈高的幸福感。當個體有愈高的共融性價值，同時生活在注重權力距離的國家，也可能會有愈高幸福感。

綜上所述，當一個人生活在與自身價值相符的文化脈絡，可能有助於提升主觀幸福感。本研究據此提出「價值觀同化效益」假設：在注重自主性的文化脈絡，即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文化較強的國家，個體之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會被增強，共融性的正向效果則會被削弱；而在強調群體規範的文化脈絡，即權力距離文化較強的國家，個體之自主性的正向效果則會減弱，共融性的正向效果會增強。精確而言，「價值觀同化效益」假設如下：個人主義、放任主義這兩種文化向度與自主性之間會有正向交互作用，或與共融性之間有負向交互作用；權力距離與自主性會有負向交互作用，或與共融性有正向交互作用。

文化一個體的價值觀互補效益

儘管同化效益的觀點受到豐富文獻支持，然而針對個體價值與文化脈絡之交互作用，尚有另一種不容忽視的重要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當個體價值觀與群體文化出現分歧，也就是個體不完全內化群體文化價值，而是發展出異於主流的價值觀，反而可能代表個體在社群中保有自主地位，同時可透過

汲取自身與文化的互補資源以更加均衡滿足不同社會心理需求，從而對幸福感有所助益，本研究稱為「價值觀互補效益」。

在全球化脈絡下，當人們普遍順應群體既有的文化價值，造成群體文化的同質單一，可能反而帶來負面後果，如此觀點在跨文化互動頻繁的今日尤受重視。在個人主義文化盛行的歐美國家，反省「過猶不及」的聲音從上世紀末浮現。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Bellah著作《失序的心靈》指出，過度偏重個性與自主性的文化觀念，將對公民社會的公共性與人際網絡造成危害[45]。學者紛紛點出當一個社會過於偏重獨立性、自主性、自由競爭等文化價值，可能招致社群網絡瓦解、孤獨、自我中心、自我提升壓力等惡果[46-48]。近期澳洲[49]、美國[50,51]等個人主義國家以年輕世代為調查對象的研究，也發現個人主義傾向與幸福感之間呈負向關聯，顯示當個體過度內化國家主流文化價值，尤其是個人主義文化價值，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個體若能發展出不同於群體文化的心理結構，則可能發揮身心效益，這點亦彰顯在近年東亞學者的思考與研究。本土心理研究指出在華人集體主義文化脈絡，即使關係倫理等文化傳統仍受一定重視，但在現代化浪潮下，兼融個體獨立性與群體相依性的「折衷自我」如今成為更有利於心理適應的自我構念[52,53]。更有研究發現，在注重集體主義文化的國家中，自認為比周遭他人更傾向「自主性」的個體，擁有較高的幸福感[54]，再次凸顯個體若能夠發展出異於群體主流的互補式價值，可能更有助於提升主觀幸福感。

除了證據現象的觀察與探討，「價值觀互補效益」更有其心理學理論基礎。最適區別理論（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提出人類普遍具有一種基本動機：在個體與群體的同化（assimilation）和分化（differentiation）之間取得最適平衡，亦即在「我」與「我們」之間拉開一段距離，既非完全被吸納於社會群體當中，也非徹底孤立自絕於社群之外，從而取得理想的均衡狀態[55]。當個體發展出不同於群體主流的價值觀，便可能產生適度分化的效果，有助於個體保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獨特性與自主控

制感，而非成為同質文化社群當中的無名個體。根據最適區辨理論，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差異，反而更可能讓個體跳脫單一文化社群身分的限制，取得群體同化與自我分化的最佳平衡，進而帶來較高的主觀幸福感。

綜上所述，個體價值若呈現出異於群體文化的互補關係，反而更可能達到自主性與共融性的互補均衡，進而提升主觀幸福感。本研究據此提出「價值觀互補效益」假設，認為個體價值觀與群體文化價值有所區別時，更有助於增加主觀幸福感；而當個體價值觀順應於群體文化時，對主觀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反而會減弱。因此，在愈注重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文化的國家，個體之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可能反而減弱，共融性的正向效果則會增強；在強調群體規範（權力距離文化較強）的國家，個體之自主性的正向效果反而會增強，共融性的正向效果則會減弱。精確而言，「價值觀互補效益」假設如下：個人主義、放任主義這兩種文化向度與自主性有負向交互作用，或與共融性有正向交互作用；權力距離與自主性有正向交互作用，或與共融性有負向交互作用。

小結

本研究結合跨文化心理學研究觀點，企圖以跨國資料庫分析回答以下兩個研究問題：首先，在未考慮文化差異時，自主性與共融性對主觀幸福感的預測效果為何？接著，若將文化因素納入考量，兩種價值觀的效果如何受到國家文化所調節？由於個體層次與國家層次的跨層次交互作用效果檢驗為本研究重點，故將採用多層次線性迴歸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 multilevel model）進行資料分析。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研究依循過去文獻證據，假設自主性與共融性對主觀幸福感皆有獨立的正向效果。針對第二個問題，本文提出兩組競爭假設，包括「價值觀同化效益」：注重個人自主獨立性的文化脈絡，可以增強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或者削弱共融性的正向效果；以及「價值觀互補效益」：注重個人自主獨立性的文化脈絡，反而會削弱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或增強共融性的正向效果。除了檢視跨層次交互作用的方向性，本研究也將由模型估計結果

導出自主性與共融性效果的跨國差異，揭示兩者對幸福感的效益是否為普世皆然的普遍現象，或在具備某些文化特徵的國家並不成立。

材料與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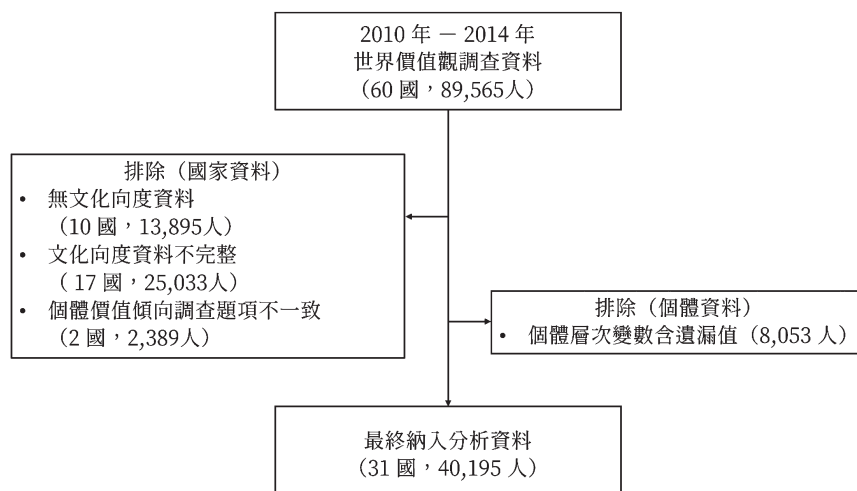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運用次級資料分析方法，整併數個大型跨國資料庫，探討個體與文化價值的交互作用。最主要之個體層次資料採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第六波（2010-2014）（下同），總共涵蓋60個國家與地區、89,565人接受調查[56]。國家層次資料包括文化向度與人類發展指數，前者取自跨文化心理學者Geert Hofstede提供開放學術用途之公開資料庫（Values Survey Modules, VSM）[57]，後者引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公佈資料[58]，另台灣的人類發展指數資料則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59]。在去除缺少文化向度資料、文化向度資料不全、個體價值觀調查題項不一致之國家樣本，以及其他個體層次變項包含遺漏值樣本後，最終留下31個國家，總共40,195筆有效樣本納入分析。詳細樣本選取流程如圖一。前述資料庫皆為公開免費取用，屬於合法公開週知資訊，且本研究資訊使用符合其公開週知之目的，符合衛署醫字第1010265075號公告之得免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

二、變項說明

依變項

「主觀幸福感」包括兩個核心成分：情緒感受與認知評價[60]。本研究採用正面情緒的測量題項，詢問受訪者「整體來說，請問您是很快樂、還算快樂、不太快樂，還是一點也不快樂？」，以四點李克特氏量表（Likert scale）計分，經反向編碼後，越高分表示越快樂。認知面向採用自評生活滿意度，詢問受訪者「整體來說，請問您對自己近來的生活滿不滿意？」為十點計分，越高分表示越滿意。這兩個題目過去已被廣泛運用於幸福感相關研究[61,62]。在本研究分析樣本中，兩題分數呈中度正相關（ $r = .463, p < .001$ ），為兼顧幸福感在理論構念上的情



圖一 樣本選取流程

緒、認知意涵，將合併兩題分數（取平均）作為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因兩題量尺不同，合併前先對四點計分的情緒測量進行線性轉換，轉為與生活滿意度相同之十點計分。

自變項

主要自變項為個體層次的兩種價值觀：「自主性」與「共融性」。兩者皆由《世界價值觀調查》題組測量，先詢問受訪者「下面這幾種人的描述像不像您」，接著呈現10道強調不同價值構面的描述。這些描述取自跨文化心理學者Schwartz發展的價值觀量表（Portrait of Values Questionnaire, PVQ）[63]，呼應其將人類價值觀區分為「權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服從」（conformity）等10構面的理論框架[64]。後續研究以因素分析針對PVQ進行降維，發現背後存在由「自主性價值」（agentive value）與「共融性價值」（communal value）組成的潛在二因子結構[65]，故本研究依此進行分析。PVQ原有42題與21題版本，於《世界價值觀調查》精簡為10題。其中「重視新點子和創造力，用自己的方式做事」、「重視很高的成就，讓別人知道他的成就」等5題屬於「自主性」；「重視舉止合宜，避免遭人指責」、「重視傳統，會遵循宗教與家庭傳下來的習俗」等另5題屬於「共融性」。每題各計1到6分，原選項為1代表很像，6代表完全

不像，經反向編碼後，越高分代表自評越接近該描述。兩種價值觀的分數為5題取平均，相同的價值觀測量方式已運用於多項跨國研究[66,67]。在本研究分析樣本中，「自主性」整體平均為3.57（SD=0.97），各國Cronbach's α 平均值0.66；「共融性」整體平均4.39（SD=0.93），各國Cronbach's α 平均值0.67。

調節變項

本研究以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權力距離等三項文化向度，作為國家層次的調節變項。Hofstede提供之公開資料庫涵蓋超過一百個國家，共包含六個向度：個人主義、權力距離、迴避不確定性、男性化、放任主義、長程思維[23-25,57]。除了本研究視為重要調節變項的三項文化向度，其他向度分數亦納入模型作為控制變項。該資料庫現已更新至2023年，為配合《世界價值觀調查》第六波調查時間，本研究取用VSM 2010版本資料[57]。由於文化向度資料之原始量尺為0至100，與其他變項的全距相比差異過大，不利於迴歸係數的呈現與解讀，故分析前將文化向度數值皆先除以10處理。

控制變項

為排除非研究關心來源的潛在混淆效果，我們遵循過去學者建議，將理論或實徵上具充分理由需控制的變項納入模型，並且

說明原因[68]。在個體層次，過去研究指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重要的人口學背景變項，因牽涉個體在社會中取得資源、滿足需求的機會，與主觀幸福感存在關聯[69-70]，故本研究將其納入控制。收入變項水準為1到10分，代表受訪者家庭收入（包含薪資、退休金、其他收入）位於該國家庭收入十等分位上的哪一位置，越高分表示家庭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變項水準為1到9分，採用跨國一致編碼系統，越高分表示教育程度越高。此外，有跨國研究證據顯示年齡與幸福感之間存在U型曲線關係[71]，故本研究亦將年齡平方（二次方）項納入控制。

在國家層次，為了控制各國於健康、教育、經濟等客觀面向上發展程度落差的效果，本研究將各國2010至2014年的人類發展指數平均值納入模型，作為國家層次的控制變項。另外如前段所述，除了作為調節變項的三種文化向度之外，其餘三項文化向度分數，包括迴避不確定、男性化、長程思維，亦皆會納入模型予以控制。

詳細變項名稱、在統計模型中之代號、概念及操作型定義如表一，而研究架構如圖二。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關注個體價值與國家文化的交互作用，使用的資料亦為個體巢集（nested）於國家群體之多層次結構，故以多層次模型進行分析。本研究使用R語言（版本4.3.2）[72]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多層次模型估計以lmerTest套件執行[73]，模型估計法均採用受限最大似估計法（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REML）。所有模型估計均透過另一個多層次模型常用軟體HLM（版本6.08）[74]重複驗證，確認結果一致。

進行多層次分析前，本研究先將個體層次的兩個自變項：「自主性」與「共融性」進行組平減（group mean centering），以利精確分離出該變項的組內（國家內）個體層次變異，進而確保在跨層次交互作用效果的估計上不受到自變項與調節變項於國家層次之組間交互作用混淆[75]。此外，由於各國教育水準的資訊已蘊含在人類發展指數此一複合指標內，個體層次的教育程度變項也在

分析前進行組平減，以準確表徵國家內部人們教育程度之個體差異的效果。其餘個體與國家層次的連續變項則進行總平減（grand mean centering）以降低多元共線性問題[76]。

多層次模型分析程序如下：首先，透過未納入自變項、僅考量資料層次結構的零模型（null model），檢視主觀幸福感的組間（跨國）差異。接著模型1納入控制變項，包括個體層次的人口學變項與國家層次的人類發展指數。模型2納入主要自變項：個體價值觀的主效果，檢驗在控制其餘變項後，自主性與共融性對幸福感的效果為何。接下來，為了確認個體價值觀的效果是否存在顯著的跨國變異，以符合檢驗跨層次交互作用的前提，模型3納入個體價值觀的隨機斜率項（random slope）。模型4則納入六項文化向度分數的主效果。最後，模型5A、5B、5C分別納入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權力距離等三項文化向度與個體價值觀的交互作用項，檢驗國家文化與個體價值的跨層次交互作用。從零模型到最終的跨層次交互作用模型，逐步加入各項效果之估計式如下所列：

$$\begin{aligned}
 SWB = & \gamma_{00} + u_0 + r \dots\dots\dots \text{零模型} \\
 & + \gamma_{10}FEMALE + \gamma_{20}AGE \\
 & + \gamma_{30}AGE^2 + \gamma_{40}INCOME \\
 & + \gamma_{50}EDU + \gamma_{01}HDI \dots\dots\dots \text{模型1} \\
 & + \gamma_{60}AGEN + \gamma_{70}COMM \dots\dots\dots \text{模型2} \\
 & + u_6AGEN + u_7COMM \dots\dots\dots \text{模型3} \\
 & + \gamma_{02}IDV + \gamma_{03}IVR + \gamma_{04}PDI \\
 & + \gamma_{05}UAI + \gamma_{06}MAS \\
 & + \gamma_{07}LTOWVS \dots\dots\dots \text{模型4} \\
 & + \gamma_{6k}CULMOD_k * AGEN \\
 & + \gamma_{7k}CULMOD_k * COMM \dots\dots\dots \text{模型5}
 \end{aligned}$$

上式中CULMOD代表模型5A至5C所對應三個作為調節變項的文化向度，k= 2~4分別代表IDV、IVR、P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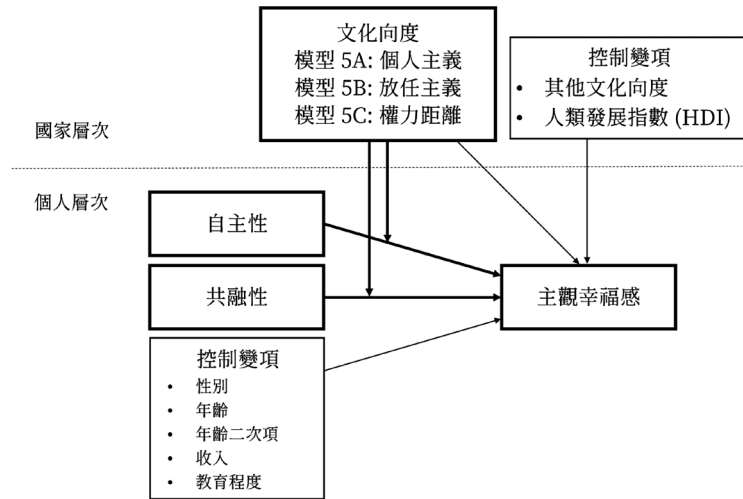
結 果

一、 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

本研究分析來自31個國家／地區，共40,195名受訪者資料，年齡介於18至95歲

表一 變項說明

變項名稱	代號	定 義
依變項		
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由快樂程度、生活滿意度兩題取平均進行測量，分數愈高代表主觀幸福感愈高。快樂程度題項原為1-4計分，將原始數值轉換為1、4、7、10以與1-10計分之生活滿意度題項合併
自變項（個體層次）		
自主性（Agency）	AGEN	由5個題目測量，詢問受訪者「下面這幾種人的描述像不像您？」：(1)「這個人重視新點子和創造力，用自己的方式做事」；(2)「這個人重視財富，擁有許多錢和昂貴的東西」；(3)「這個人重視很高的成就，讓別人知道他的成就」；(4)「這個人重視冒險，過刺激的生活」；(5)「這個人追求快樂，寵自己」。受訪者回答「完全不像、不像，只有一點像、有些像、像、很像」。計1-6分，將5個題目得分取平均，分數愈高表示愈傾向自主性
共融性（Communion）	COMM	由5個題目測量，詢問受訪者「下面這幾種人的描述像不像您？」：(1)「這個人重視為身邊的人幫助，關心他們的幸福」；(2)「這個人重視舉止合宜，避免遭人指責」；(3)「這個人重視傳統，會遵循宗教與家庭傳下來的習俗」；(4)「這個人重視居住安全，避免任何可能的危險」；(5)「這個人重視環境保護，關心大自然」。回答與計分方式同上，分數愈高表示愈傾向共融性
調節變項（國家層次）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IDV	分數愈高表示一個社會愈重視個體的自由和獨立；分數愈低，則表示傾向集體主義，即社會成員偏好將彼此視為人際關係與群體的一份子，注重社會規範與和諧。原始全距為0-100
放任主義 (Indulgence)	IVR	分數愈高表示一個社會容許人們投入享樂活動、追隨慾望滿足的程度；分數愈低，則表示社會更強調規範、約束、對個人自由的節制。原始全距為0-100
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	PDI	分數愈高表示一個社會傾向接受垂直式的權力不平等，人們習慣服從掌權者的意向與決策，較不敢表示反對意見；分數愈低表示該文化愈重視平等，社會成員偏好水平式的權力結構。原始全距為0-100
控制變項（個體層次）		
性別	FEMALE	虛擬編碼：0（參考組）為男性，1為女性
年齡	AGE	受訪者自陳年齡
年齡二次項	AGE ²	年齡數值之平方（二次方）
收入	INCOME	將受訪者家庭收入依其國家之家庭收入十等分位進行分組，計1-10分，愈高分表示收入愈高
教育程度	EDU	《世界價值觀調查》將各國教育編制統一編入跨國一致的編碼系統，計1-9分，愈高分表示教育程度愈高
控制變項（國家層次）		
男性化 (Masculinity)	MAS	分數愈高表示一個社會愈強調競爭、成就、成功等男性化特質；分數愈低，表示一個社會愈在乎與周遭環境保持和諧，且較不重視個人競爭與物質成就。原始全距0-100
迴避不確定 (Uncertainty Avoidance)	UAI	分數愈高表示一個社會對不確定性、模糊性的容忍程度愈低，人們更傾向於事前規劃與循規蹈矩以控制不確定感；分數愈低則代表社會成員更能順應與接納變化。原始全距0-100
長程思維 (Long-term Orientation)	LTOWVS	分數愈高表示一個社會傾向鼓勵人們以長程時間看待事物，著眼於未來與長期目標，重視堅持、忍耐、毅力等價值。原始全距0-100
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綜合各國人民健康（預期壽命）、社會（受教育年限）、經濟（國民所得）指標計算公布，最大值為1，數值愈高表示整體而言該國客觀發展程度愈高



圖二 研究架構

($M=44.2$, $SD=16.6$)，女性占51.5%。各國受訪者數介於697人（紐西蘭）至2,900人（印度）。主觀幸福感之總平均值7.45（ $SD=1.74$ ），最幸福的三個國家依序為墨西哥（ $M=8.67$, $SD=1.50$ ）、哥倫比亞（ $M=8.41$, $SD=1.53$ ）、瑞典（ $M=7.87$, $SD=1.50$ ）；最不幸的三個國家依序為愛沙尼亞（ $M=6.45$, $SD=1.73$ ）、羅馬尼亞（ $M=6.54$, $SD=1.92$ ）、俄羅斯（ $M=6.63$, $SD=1.70$ ）。全體樣本的自主性平均值3.57（ $SD=0.97$ ），共融性平均值則是4.39（ $SD=0.93$ ）。若將每個國家分別視為一筆樣本，針對各國內受訪者之自主性與共融性分數各自進行相依t檢定，31個國家的檢定結果皆為共融性顯著高於自主性（ p s < .001），即各國內人們的共融性價值都高於自主性價值。全樣本與各國之個體及國家層次變項描述統計如表二。

接著由全樣本之雙變項相關的角度檢視變項間關聯。個體層次變項相關矩陣如表三，自主性與主觀幸福感呈低度正相關（ $r = .09$, $p < .01$ ），共融性與主觀幸福感亦呈低度正相關（ $r = .13$, $p < .01$ ），符合研究預期，兩種價值觀都可能對幸福感有正向效益。此外，自主性與共融性亦為正相關（ $r = .37$, $p < .01$ ），顯示兩種價值之間並非對立關係。

國家層次變項相關矩陣如表四。本研

究以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權力距離等三項文化向度作為調節變項，並以個體之「自主性」對應個人主義與放任主義、「共融性」對應權力距離，結果顯示三者間的相關趨勢亦呼應此框架：個人主義與權力距離為顯著負相關（ $r = -.62$, $p < .01$ ），個人主義與放任主義為未達顯著的正相關趨勢（ $r = .24$, $p > .05$ ），放任主義與權力距離則為未達顯著的負相關趨勢（ $r = -.31$, $p > .05$ ）。由於國家單位數僅31國，相關係數較不易達到顯著，但三項文化向度之間的兩兩相關方向皆符合本研究之理論預設。

進一步分析各國之雙變項相關，本研究納入的31國中，年齡與幸福感的相關係數介於-.28（ $p < .001$ ）到.14（ $p < .001$ ）；收入與幸福感的相關介於-.02（ $p = .62$ ）到.46（ $p < .001$ ）；教育程度與幸福感的相關介於-.07（ $p < .05$ ）到.23（ $p < .001$ ）。至於本研究主要關注的價值觀變項，自主性與幸福感的相關在各國之中介於-.05（ $p = .19$ ）到.26（ $p < .001$ ）；共融性與幸福感的相關介於-.002（ $p = .95$ ）到.19（ $p < .001$ ）。由此可見，個體變項（不論自變項或控制變項）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可能存在不容忽視的跨國差異，故不宜忽略個體鑲嵌於國家的多層次結構，更適於運用多層次模型分析個體層次自變項效果如何受到國家層次變項調節。

表二 描述統計

國家／地區	樣本數	主觀 幸福感	自主 性	共融 性	個人 主義	放縱 主義	權力 距離	迴避 不確 定	男性 化	長程 思維	人類 發展 指數	女性 比 (%)	平均 年齡	收入	教育 程度
阿根廷	918	7.50	3.68	4.16	46	62	49	86	56	20	0.84	53.2	43.1	5.3	5.6
澳洲	1,000	7.67	3.21	4.16	90	71	38	51	61	21	0.93	54.9	50.8	5.2	6.7
巴西	1,420	7.81	3.51	4.83	38	59	69	76	49	44	0.74	62.3	42.4	4.4	5.0
智利	813	7.24	3.93	4.64	23	68	63	86	28	31	0.83	50.7	44.2	4.8	5.5
中國	1,860	7.00	3.42	4.18	20	24	80	30	66	87	0.71	50.6	43.6	4.4	5.3
哥倫比亞	1,458	8.41	3.84	5.06	13	83	67	80	64	13	0.74	50.2	40.3	5.1	5.7
愛沙尼亞	1,414	6.45	3.18	4.10	60	16	40	60	30	82	0.87	56.2	48.2	4.4	6.7
德國	939	7.32	3.58	3.95	67	40	35	65	66	83	0.93	50.8	49.6	4.8	5.2
香港	949	7.09	3.52	4.13	25	17	68	29	57	61	0.92	54.3	44.3	4.7	5.9
印度	2,900	7.23	3.79	4.50	48	26	77	40	56	51	0.60	42.1	40.5	4.7	4.3
日本	1,509	7.31	2.68	3.31	46	42	54	92	95	88	0.91	46.9	51.2	4.2	6.9
馬來西亞	1,299	7.86	3.69	4.72	26	57	100	36	50	41	0.78	48.6	40.0	6.0	5.1
墨西哥	1,904	8.67	3.60	4.76	30	97	81	82	69	24	0.76	50.0	37.2	3.3	5.3
荷蘭	1,483	7.64	2.86	3.66	80	68	38	53	14	67	0.93	50.9	54.5	4.6	6.0
紐西蘭	697	7.79	3.23	4.04	79	75	22	49	58	33	0.93	57.7	49.8	5.8	7.5
巴基斯坦	1,111	7.59	4.41	4.59	14	0	55	70	50	50	0.51	46.6	34.4	5.5	4.1
秘魯	1,067	7.23	3.55	4.54	16	46	64	87	42	25	0.74	49.0	38.4	4.7	5.7
菲律賓	1,194	7.74	3.97	4.90	32	42	94	44	64	27	0.69	50.1	42.6	4.2	5.6
波蘭	869	7.34	3.66	4.71	60	29	68	93	64	38	0.85	55.1	47.4	4.5	5.7
羅馬尼亞	1,342	6.54	3.46	4.71	30	20	90	90	42	52	0.81	56.3	47.6	4.9	6.4
俄羅斯	1,294	6.63	4.16	4.59	39	20	93	95	36	81	0.81	54.3	42.1	4.5	6.7
新加坡	1,921	7.44	3.85	4.22	20	46	74	8	48	72	0.92	54.9	41.9	5.7	6.0
斯洛維尼亞	979	7.23	3.60	4.67	27	48	71	88	19	49	0.89	57.7	48.8	4.9	5.7
韓國	1,133	6.89	3.61	3.98	18	29	60	85	39	100	0.90	50.2	42.9	5.0	7.6
瑞典	1,110	7.87	3.44	4.07	71	78	31	29	5	53	0.92	51.5	48.0	5.4	7.1
台灣	1,117	7.22	3.13	4.33	17	49	58	69	45	93	0.88	51.2	43.8	4.8	6.9
泰國	1,109	7.76	3.81	4.40	20	45	64	64	34	32	0.75	48.0	45.5	4.6	4.8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	911	7.86	3.66	4.88	16	80	47	55	58	13	0.80	54.1	45.4	5.0	4.6
土耳其	1,504	7.40	4.23	4.77	37	49	66	85	45	46	0.78	50.9	38.1	5.7	5.5
美國	2,077	7.62	3.14	4.11	91	68	40	46	62	26	0.92	51.4	49.2	5.2	7.8
烏拉圭	894	7.61	3.32	4.47	36	53	61	98	38	26	0.80	53.1	44.6	4.5	4.7
全體樣本	40,195	7.45	3.57	4.39	39.8	48.6	61.8	65.2	48.7	49.3	0.83	51.5	44.2	4.8	5.8

註：表中呈現原始資料之描述統計。文化向度原始資料最小值為0，最大值100，多層次模型中會先除以10處理。收入變項因採各國家庭收入十等分位對受訪者分組，該項數值全距為1-10，各國平均值並非直接反映特定幣值之收入金額。教育程度為《世界價值觀調查》使用之跨國一致編碼系統，全距1-9，可進行國家間比較。

表三 個體變項相關矩陣

個體層次變項	1	2	3	4	5	6
1. 性別 (1=女性)						
2. 年齡	.01					
3. 收入	-.04**	-.10**				
4. 教育程度	-.04**	-.21**	.26**			
5. 自主性	-.10**	-.27**	.14**	.02**		
6. 共融性	.04**	.02**	-.01	-.09**	.37**	
7. 主觀幸福感	.01**	-.07**	.21**	.05**	.09**	.13**

* $p < .05$, ** $p < .01$ 。

表四 國家變項相關矩陣

國家層次變項	1	2	3	4	5	6	7
1. 個人主義							
2. 放任主義	.24						
3. 權力距離	-.62**	-.31					
4. 迴避不確定	-.18	-.04	.10				
5. 男性化	-.01	-.00	.12	-.00			
6. 長程思維	-.05	-.57**	.01	-.10	-.09		
7. 人類發展指數	.50**	.28	-.49**	-.09	-.14	.26	
8. 主觀幸福感	.04	.77**	-.11	-.13	.22	-.63**	-.16

* $p < .05$, ** $p < .01$ 。

二、多層次模型分析

本研究首先透過零模型檢視主觀幸福感的組間差異，接著依序納入控制變項、自變項、自變項之隨機效果項、國家層次調節變項主效果項、跨層次交互作用項。各個多層次模型的分析結果如表五。

依據零模型結果計算依變項的組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為 0.077，大於過去學者建議標準 0.059[77]，表示主觀幸福感有不可忽視的跨國差異。本研究關心的議題必須仰賴跨層次交互作用的檢驗，且幸福感的跨國變異可解釋 7.7% 整體變異，故後續分析需以多層次模型進行，以避免低估標準誤、造成型 I 誤差 (type I error) 膨脹的問題[74]。

模型 1 納入個體與國家層次的控制變項，結果顯示女性比起男性有較高幸福感 ($b = 0.093$, $p < .001$)，收入 ($b = 0.182$, $p < .001$) 與教育程度 ($b = 0.018$, $p < .001$) 對幸福感均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年齡有負向線性效果 ($b = -0.004$, $p < .001$) 與正向的二次曲線效果 ($b = 0.0002$, $p < .001$)。在國

家層次，人類發展指數並無顯著效果 ($b = -0.836$, $p = .34$)。

模型 2 納入個體層次的主要自變項：「自主性」與「共融性」兩種價值觀。結果顯示，在控制前述變項後，自主性 ($b = 0.062$, $p < .001$) 與共融性 ($b = 0.191$, $p < .001$) 對主觀幸福感皆有顯著的正向效果。模型 3 進一步納入兩者的隨機斜率項，結果顯示自主性與共融性的效果均存在顯著的跨國變異 ($ps < .001$)，表示兩種價值觀與幸福感的關聯皆因國家而不同，因此適合繼續進行跨層次交互作用分析。

模型 4 納入國家層次的六項文化向度分數，結果顯示，當國家文化愈是傾向放任主義 ($b = 0.181$, $p < .001$)，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愈高。而在納入文化向度的主效果後，個體層次的自主性 ($b = 0.060$, $p < .05$) 與共融性 ($b = 0.182$, $p < .001$) 皆仍維持顯著的正向效果。

最後，模型 5A 至 5C 檢驗個體價值觀與三種國家文化向度之間的跨層次交互作用。模型 5A 納入個人主義文化與兩種價值觀的

290

固定效果	零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5C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Coeff. (s.e.)	
截距	7.451***	(0.087)	7.339***	(0.089)	7.345***	(0.089)	7.345***	(0.089)	7.345***	(0.089)	7.358***	(0.051)	7.359***	(0.051)	7.359***	(0.051)
個人層次																
女性 (FEMALE)			0.093***	(0.016)	0.088***	(0.016)	0.087***	(0.016)	0.087***	(0.016)	0.086***	(0.016)	0.087***	(0.016)	0.086***	(0.016)
年齡 (AGE)			-0.004***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0.005***	(0.001)
年齡二次項 (AGE2)			0.0002***	(0.000)	0.0002***	(0.000)	0.0002***	(0.000)	0.0002***	(0.000)	0.0002***	(0.000)	0.0002***	(0.000)	0.0002***	(0.000)
收入 (INCOME)			0.182***	(0.004)	0.180***	(0.004)	0.180***	(0.004)	0.180***	(0.004)	0.180***	(0.004)	0.180***	(0.004)	0.180***	(0.004)
教育程度 (EDU)			0.018***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自主性 (AGEN)					0.062***	(0.010)	0.060*	(0.025)	0.060*	(0.025)	0.059*	(0.024)	0.063**	(0.020)	0.064*	(0.024)
共融性 (COMM)					0.191***	(0.010)	0.182***	(0.018)	0.182***	(0.018)	0.182***	(0.018)	0.181***	(0.018)	0.180***	(0.017)
國家層次																
人類發展指數 (HDI)			-0.836	(0.866)	-0.811	(0.866)	-0.813	(0.865)	-1.911**	(0.678)	-1.910**	(0.678)	-1.911**	(0.678)	-1.909**	(0.678)
個人主義 (IDV)									0.001	(0.028)	0.001	(0.028)	0.001	(0.028)	0.001	(0.028)
權力距離 (PDI)									-0.004	(0.034)	-0.004	(0.034)	-0.004	(0.034)	-0.004	(0.034)
放縱主義 (IVR)									0.181***	(0.031)	0.181***	(0.031)	0.181***	(0.031)	0.181***	(0.031)
迴避不確定 (UAI)									-0.014	(0.021)	-0.014	(0.021)	-0.014	(0.021)	-0.014	(0.021)
長程思維 (LTOWVS)									0.001	(0.028)	0.001	(0.028)	0.001	(0.028)	0.001	(0.028)
男性化 (MAS)									0.055*	(0.027)	0.055*	(0.027)	0.055*	(0.027)	0.055*	(0.027)
跨層次交互作用																
自主性 × 文化向度 (CULMOD)											-0.021*	(0.010)	-0.036***	(0.009)	0.025*	(0.012)
共融性 × 文化向度 (CULMOD)											0.007	(0.008)	0.004	(0.008)	-0.021*	(0.009)
隨機效果																
國家內變異 $\gamma_{ij}(\sigma_e^2)$	2.775		2.617		2.583		2.570		2.570		2.570		2.570		2.570	
國家間變異 $\mu_{ij}(\tau_{i0})$	0.230		0.237		0.237		0.237		0.069		0.069		0.069		0.069	
自主性 $\mu_{ij}(\tau_{a0})$							0.015		0.015		0.014		0.009		0.014	
共融性 $\mu_{ij}(\tau_{c0})$							0.007		0.007		0.007		0.007		0.006	
ICC	0.77															
Deviance	155,236.1		152,935.7		152,426.7		152,305.7		152,297.8		152,308.2		152,298.7		152,303.6	

$p < .001$, $p < .01$, $p < .05$, $p < .06$ 。零模型ICC計算方式為國家層次組間變異除以總變異： $\tau_{00}^2/(\tau_{00}^2 + \sigma^2)$ 。

交互作用項，結果發現個人主義與自主性出現顯著的負向交互作用 ($b = -0.021, p < .05$)。這表示個人主義文化會調節自主性的效果：在個人主義文化較強的國家，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相對減弱。另外，個人主義與共融性之間則無顯著交互作用 ($b = 0.007, p = .41$)。

模型5B改為考慮放任主義文化與個體價值觀的交互作用，結果與模型5A相似：放任主義對自主性有顯著的負向調節效果 ($b = -0.036, p < .001$)，表示在放任主義文化較強的國家，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相對減弱。而放任主義與共融性之間亦無顯著交互作用 ($b = 0.004, p = .57$)。

模型5C結果顯示，權力距離與自主性之間有達到邊緣顯著的正向交互作用 ($b = 0.025, p < .06$)，同時與共融性有顯著的負向交互作用 ($b = -0.021, p < .05$)。這代表在權力距離文化較強的國家，自主性對於幸福感的正向效果略為增強，共融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則會減弱。

為了更準確地掌握跨層次交互作用的意涵，圖三以視覺化方式具體呈現各國「價值觀之估計效果」與「文化向度分數」的二維散布圖；同時繪製J-N圖 (Johnson-Neyman plot) 呈現多層次模型估計之自變項效果隨不同調節變項水準變化趨勢[78]，有助於辨別在各個文化向度由低至高的國家當中，自主性與共融性對幸福感的效果如何增強、減弱或不變。

圖三A1至C1以隨機斜率模型 (模型3) 所估計「各國自主 (上半部) / 共融性 (下半部) 對幸福感之效果」為y軸，「文化向度分數」為x軸 (採原始分數)，呈現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權力距離由低至高的各個國家，自變項效果的分布情形，圓圈大小代表該國樣本數。可發現隨著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提高，自主性的正向效果有減弱趨勢；隨著權力距離提高，自主性的正向效果逐漸增強，共融性的正向效果則逐漸減弱。圖三A2、B2、C2為根據模型5A、5B、5C分析結果繪製的J-N圖，呈現三種文化向度 (調節變項) 由低分至高分時，所對應之自變項效果估計值及其95%信賴區間，粗體線表示分析資料之真實全距。以深灰色標記的信賴區間表示，在對應的文化向度分數下，自變項

效果顯著大於或小於0；以淺灰色標記表示該文化向度分數下，自變項無顯著效果 (信賴區間包含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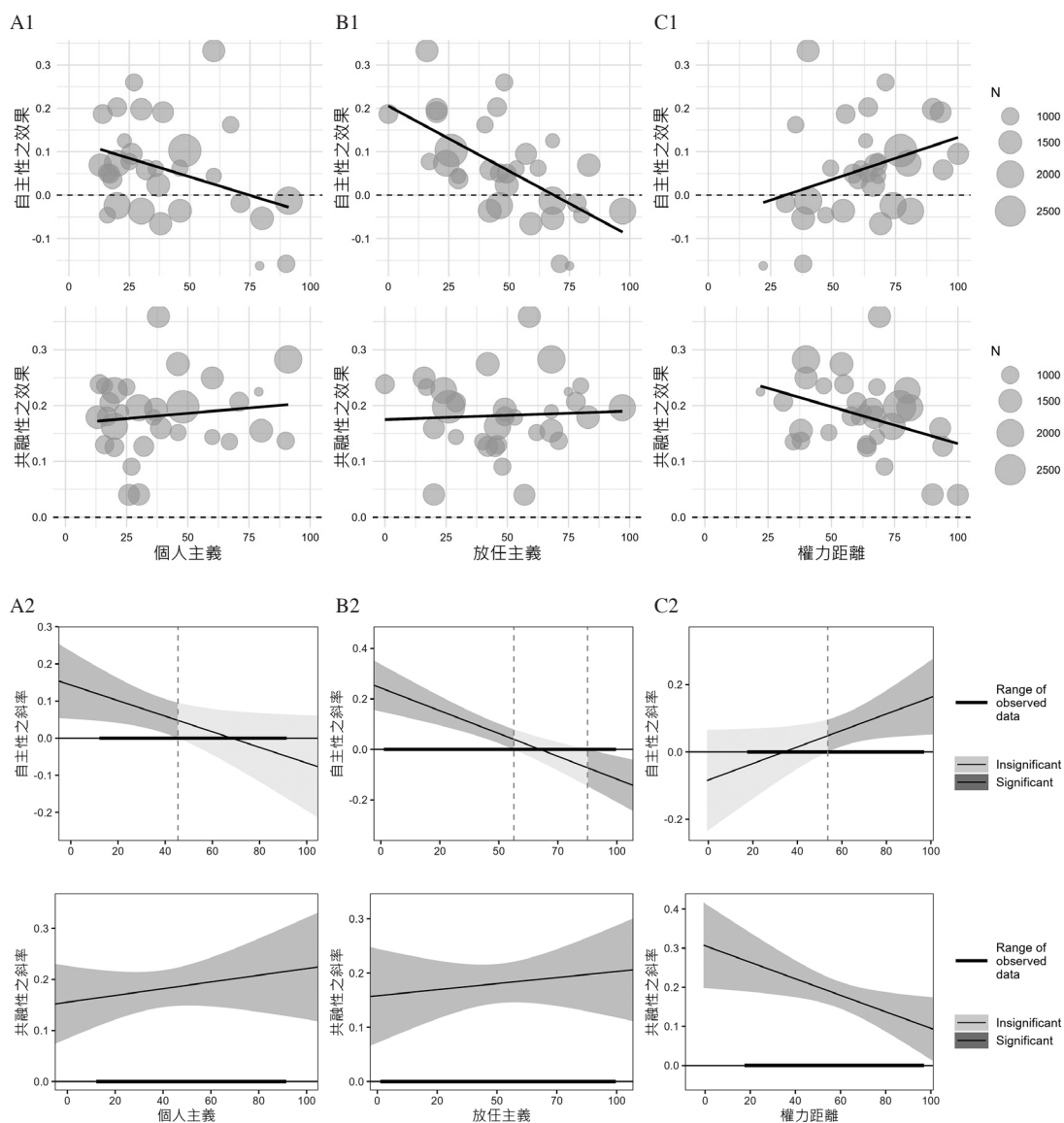
討 論

本研究運用多層次模型分析《世界價值觀調查》第六波中31國、共40,195名受訪者資料，探討過去文獻鮮少直接觸及的議題：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人們的主觀幸福感。精確而言，本研究探討主觀幸福感與個體價值觀的關聯如何受到文化脈絡所調節，進而檢驗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之間會發揮「同化效益」或「互補效益」。結合跨文化心理學的觀點與取徑，本研究得以為全球心理健康議題帶來新的洞見。

首先，在未考慮自變項效果跨國差異時，自主性與共融性對幸福感都有正向效果。這表示跨國普遍而言，一個人重視「獨立自主」或「融入社群」的價值觀皆對幸福感有助益。這呼應了社會心理學、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觀點與研究證據：自主性與共融性作為人類兩大基本心理需求，對於生活福祉皆有缺一不可的重要性[18-20,31,32]，也擴展過去多限於美國樣本的研究發現。價值觀是個體衡量事物價值並據以行事的內在原則，過去常被視為社會學、政治學或心理學的概念，本研究則指出價值觀同時也是心理健康的有效預測因子，未來宜納入相關政策考量。

本研究進一步從跨國比較觀點，揭示自主性、共融性對主觀幸福感的效果並非普世皆同，而是因國家而異。不過相對而言，共融性的正向效果較具跨國穩定性，這反映在隨機斜率模型估計結果中，各國對應的自變項效果均為正值 (見圖三A1至C1下半部)；反之，自主性的正向效果則較不穩定，隨機斜率模型中部分國家之效果估計接近0，甚至負值 (見圖三A1至C1上半部)。這代表不論在怎樣的文化脈絡中，個體的共融性價值更穩定伴隨較高幸福感，顯示人際關係與社會歸屬對情緒調節、身心健康的幫助[79,80]，相較於自主性價值在改善心理適應的效果，更加具備跨文化普遍性。

最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價值觀與幸福感關聯的跨國差異，可透過個體寓居其中的文化脈絡來解釋。換言之，文化價值能夠



圖三 跨層次交互作用視覺化

調節個體價值對主觀幸福感的效果，且跨層次交互作用分析結果支持「價值觀互補效益」。在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文化較強的國家，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會減弱：圖三A2顯示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較容易出現在低個人主義（即集體主義）國家，在高個人主義國家則趨近不顯著。圖三B2顯示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較常出現在低放任主義，即社會規範約束性較強的國

家，而在放任主義文化極強的國家，自主性甚至有負向效果。一方面這可能表示在高度重視個人目標與欲望的文化，人們的自主性需求已充分滿足，以致於自主性價值的個體差異效果不易凸顯。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偏向集體主義、社會約束較強的國家，個體如果能自主發展出不同於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自主性），將有助於增進幸福感。而呼應過去研究，在較極端情況下，一旦個體與群體文

化都一致注重獨立性，反而可能破壞人我關係的均衡，最終不利人們的身心健康[49-51]。

本研究也發現，在權力距離文化較強的國家，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反而相對增強，共融性的正向效果則會減弱。圖三C2顯示自主性對幸福感的正向效果僅出現在權力距離中至高的國家。這可能反映了注重權威文化的國家長期對於個體獨立自主地位的忽略、壓抑，導致個體更需仰賴自身價值觀的培養與行動投入，才能滿足自主性的基本心理需求。因此在相對忽視個體自主性的文化脈絡，人們若仍能發展出自主性，將更有助於幸福感提升。

綜言之，注重「自主性」或「共融性」的價值觀普遍而言皆可增進幸福感，其中共融性的效益較穩定。進一步檢驗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的交互作用，分析結果支持「價值觀互補效益」：當個體發展形成的價值觀與群體主流有所差異，如此的價值觀分歧反而對於增進幸福感更有幫助。如前所述，自主性與三項文化向度都出現顯著的跨層次交互作用：當一國文化愈是重視集體主義、社會規範與約束、權威與服從價值，抱持較高自主性的個體，反而更容易有較佳心理福祉。不過相對而言，「價值觀互補效益」在共融性上則較不明顯（僅模型5C與權力距離之交互作用一項達顯著），顯示價值觀互補效益可能有其不對稱性，主要體現於自主性價值。

價值觀互補效益：文獻對話

過去文獻經常主張個體與群體之間最好在價值觀上相互適配，這種觀點似乎與本研究結果出現矛盾。例如Ogihara與Uchida指出，在重視集體主義文化的日本，抱持較高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人交友狀況較差、幸福感較低，然而同樣現象卻未發生在個人主義文化盛行的美國[44]。他們推論這反映西方文化在全球現代化脈絡下影響各國人民，受到個人主義價值觀浸染的個體從而可能較難回頭融入固有的文化傳統與社群網絡。然而以證據的完整性而言，這份研究與早期部分跨文化心理學文獻類似，是透過方便取樣取得的小樣本證據，且欲以僅兩個國家之比較來指稱文化差異。相對而言，本研究則分析多國研究調查機構蒐集之代表性樣本組成的

大型跨國資料，更加全面且具備較高的外效度。事實上，若只取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第六波的美國、日本資料，以線性迴歸分析個體價值觀與幸福感的關聯，會發現兩國結果相似：控制人口學變項後，共融性對幸福感皆有顯著正向效果（美國： $b = .30, p < .001$ ；日本： $b = .26, p < .001$ ），自主性皆無顯著效果（美國： $b = -.01, p = .79$ ；日本： $b = .02, p = .73$ ）。但這不代表文化差異可以忽略。包含美國與日本在內的31國資料顯示，自主性與共融性對於幸福感的效果確實存在跨國差異，且與個人主義、放任主義、權力距離這三個文化向度之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本研究結果支持個體價值觀若能和文化主流脫鉤，將更加增進幸福感的「互補效益」觀點。未來研究若要繼續探討文化脈絡與個體因素的交互作用，亦應採用更全面的資料證據為宜。

本研究發現個體價值——尤其是自主性價值——若與文化價值呈現互補關係，對主觀幸福感會有正面效益，而兩者若朝相同方向發展反而可能減損幸福感。這可能是因為當個體價值觀與群體文化出現同質性，主要源自文化體系長期形塑個體心智的濡化（enculturation）效果，而非個體主動的學習或反思，這將可能導致個體在自主性與共融性的折衝中，深受群體文化影響而遮蔽或忽略其中一邊的重要性，造成偏頗發展。相反的，根據最佳區辨理論，如果個體能夠發展出有別於群體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反而更能在「我」與「我們」之間取得均衡，有益於身心福祉。本研究結果也呼應近年社會心理學、跨文化與本土心理學者的思考，包括在個人主義盛行的西方世界，學者反思過度偏重個人主義文化伴隨的原子化、孤立、競爭壓力等困境[45-48]，東亞學者則以「折衷自我」等概念探討人們如何在追求獨立自主與融入社群之間取得平衡的狀態及歷程[52-53]。這些思考都共同揭示了不同價值應以互補發展為宜，本研究則透過跨國資料分析為此觀點提供更豐富的證據基礎。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儘管整併了數個跨國資料庫以分析個體價值與文化脈絡的交互作用，本研究仍存在幾項限制。首先，前述結果皆是基於橫斷資

料 (cross-sectional data) 的分析，無法直接推論因果關係。未來研究可採用包含中介路徑的模型，探討文化脈絡與個體價值觀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幸福感之心理及行為歷程。舉例而言，抱持與主流文化相異價值的個體可能擁有較高能动性或控制感，從而對生活福祉有助益；或因為在個體與群體間的同化—分化兩端取得平衡，同時擁有獨特感與歸屬感，繼而感到幸福[55]。若能瞭解個體價值與文化價值的交互作用機制，將有助於未來發展對應之公共衛生與心理健康介入方案，如透過文化敏感的價值觀教育來增進民眾心理福祉。

其次，同樣基於現有資料庫限制，本研究未能將文化價值與個體價值的動態變遷納入考量，從時間性角度探究兩者的複雜互動。隨著全球現代化發展，世界各國經濟文化體制受歐美影響而漸趨個人主義，尤其是原本傾向集體主義、重視社會規範傳統的亞洲國家[81]。在群體文化變遷趨勢下，個體價值觀的變化與否或變化軌跡差異，可能如何影響幸福感？值得往後繼續探討。

測量方面，本研究合併《世界價值觀調查》兩題作為主觀幸福感的複合指標，雖已涵蓋情緒、認知兩大面向[60]，但與其他衡量幸福感的常用工具，如生活滿意度量表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82]或正負向情緒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83]相比，仍相對簡便。且前述工具在幸福感的理論架構中都仍落在享樂主義取向 (hedonic) 框架內[84]，建議未來研究在兼顧測量品質與效率的情況下，除可採用更完備的測量工具來探討個體價值與文化脈絡的交互作用外，更可延伸探討倫理至善取向 (eudaimonic) 中更廣泛的指標，如心理幸福感量表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85]等等。而就公共衛生角度而言，未來研究更能採用如自評身體健康、就醫次數，或更完整之一般健康問卷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等重要指標，探討個體與文化的差異、互補或契合性，可能如何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

結論

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關鍵指標，同時有益長期身體健康[5,6]，如何打造令人們幸福

快樂的生活環境，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標。本研究從跨國資料分析的宏觀角度，指出個體價值觀若與群體文化有所分歧互補，比起受到同化，更可能增進幸福感。據此，政府或相關機構在推動幸福感提升措施時，不妨將牽涉人我關係之重要價值觀的培養，以及價值觀的個體—文化搭配關係積極納入考量。儘管文化往往在家庭教養、學校教育等社會化過程中，潛移默化影響個體心智發展[86]，然而根據本研究結果，個體價值觀與群體社群「趨同」卻不會伴隨較佳的心理適應。更重要的課題，應是瞭解自身所屬文化注重與忽略之處，鼓勵人們學習不同價值觀的個體，讓自己的價值思維能和主流文化之間拉開距離進而自主發展，達到個體與群體之間、自主性與共融性之間的均衡。

參考文獻

1. Diener E, Suh EM, Lucas RE, Smith H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 Bull* 1999;**125**:276-302. doi:10.1037/0033-2909.125.2.276.
2. Das KV, Jones-Harrell C, Fan Y, Ramaswami A, Orlove B, Botchwey N. Understand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and 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 Rev* 2020;**41**:25. doi:10.1186/s40985-020-00142-5.
3. Frey BS, Stutzer A.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Human Well-Be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i:10.1515/9781400829262.
4. Howell RT, Kern ML, Lyubomirsky S. Health benefits: meta-analytically determining the impact of well-being on objective health outcomes. *Health Psychol Rev* 2007;**1**:83-136. doi:10.1080/17437190701492486.
5. Ong AD. Pathways linking positive emotion and health in later life. *Curr Dir Psychol Sci* 2010;**19**:358-62. doi:10.1177/0963721410388805.
6. Diener E, Chan MY. Happy people live longer: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tributes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Appl Psychol Health Well Being* 2011;**3**:1-43. doi:10.1111/j.1758-0854.2010.01045.x.
7. WHO. Health promotion glossary of terms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tem/9789240038349>. Accessed October 1, 2023.
8. Diener E, Lucas R, Schimmack U, Helliwell J. *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oi:10.1093/acprof:oso/9780195334074.001.0001.

9. Oishi S, Schimmack U. Culture and well-being: a new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ical wealth of nations. *Perspect Psychol Sci* 2010;**5**:463-71. doi:10.1177/1745691610375561.
10. Diener E, Diener M. 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J Pers Soc Psychol* 1995;**68**:653-63. doi:10.1037/0022-3514.68.4.653.
11. Oishi S, Diener E, Lucas RE, Suh EM.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perspectives from needs and values.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99;**25**:109-27. doi:10.1177/01461672992511006.
12. Uchida Y, Kitayama S, Mesquita B, Reyes JAS, Morling B. Is perceived emotional support beneficial? Well-being and health in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cultures.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08;**34**:741-54. doi:10.1177/0146167208315157.
13. Mesquita B, Karasawa M. Different emotional lives. *Cogn Emot* 2002;**16**:127-41. doi:10.1080/0269993014000176.
14. Triandis HC.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as cultural syndromes. *Cross Cult Res* 1993;**27**:155-80. doi:10.1177/106939719302700301.
15. Markus HR, Kitayama S. Cultures and selves: a cycle of mutual constitution. *Perspect Psychol Sci* 2010;**5**:420-30. doi:10.1177/1745691610375557.
16. Leung AKY, Cohen D. Within- and between-culture varia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 cultural logics of honor, face, and dignity cultures. *J Pers Soc Psychol* 2011;**100**:507-26. doi:10.1037/a0022151.
17. Na J, Grossmann I, Varnum MEW, Kitayama S, Gonzalez R, Nisbett 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not always reducible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PNAS* 2010;**107**:6192-7. doi:10.1073/pnas.1001911107.
18. Baumeister RF, Leary M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 Bull* 1995;**117**:497-529. doi:10.4324/9781351153683-3.
19. Ryan RM, Deci E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 Psychol* 2000;**55**:68-78. doi:10.1037/0003-066X.55.1.68.
20. Hornsey MJ, Jetten J. The individual within the group: balancing the need to belong with the need to be different. *Pers Soc Psychol Rev* 2004;**8**:248-64. doi:10.1207/s15327957pspr0803_2.
21. Sheldon KM, Cooper ML. Goal striving within agentic and communal roles: separate but functionally similar pathways to enhanced well-being. *J Pers* 2008;**76**:415-48. doi:10.1111/j.1467-6494.2008.00491.x.
22. Wiggins JS. Agency and communion as conceptual coordinates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In: Cicchetti D, Grove WM eds. *Thinking Clearly about Psych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Paul 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89-113.
23.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doi:10.1016/S0005-7967(02)00184-5.
24. Hofstede G, Hofstede GJ, Minkov M.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ublishing, 2010.
25. Hofstede G. 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 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 *Online Readings Psychology Culture* 2011;**2**. doi:10.9707/2307-0919.1014.
26. Triandis HC.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J Pers* 2001;**69**:907-24. doi:10.1111/1467-6494.696169.
27. Schwartz B.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Am Psychol* 1990;**45**:7-15. doi:10.1037/0003-066X.45.1.7.
28. Chiniara M, Bentein K. Linking servant leadership to individual performance: differentia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edness need satisfaction. *Leadersh Q* 2016;**27**:124-41. doi:10.1016/j.leaqua.2015.08.004.
29. Ruzek EA, Hafner CA, Allen JP, Gregory A, Mikami AY, Pianta RC. How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motivates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erceived peer relatedness, autonomy support, and competence. *Learn Instr* 2016;**42**:95-103. doi:10.1016/j.learninstruc.2016.01.004.
30. Buchanan K, Bardi A. The roles of values, behavior, and value-behavior fit in the rela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to well-being. *J Pers* 2015;**83**:320-33. doi:10.1111/jopy.12106.
31. Helgeson VS. Rela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to well-being: evidence and potential explanations. *Psychol Bull* 1994;**116**:412-28. doi:10.1037/0033-2909.116.3.412.
32. Helgeson VS, Fritz HL. Unmitigated agency and unmitigated communion: distinctions from agency and communion. *J Res Pers* 1999;**33**:131-58. doi:10.1006/jrpe.1999.2241.
33. Minkov M. *What Makes Us Different and Simila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nd Other Cross-Cultural Data*. Sofia, Bulgaria: Klasika i Stil Publishing House, 2007.
34. Bleidorn W, Schönbrodt F, Gebauer JE, Rentfrow PJ, Potter J, Gosling SD. To live among like-minded others: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personality city personality fit and self-esteem. *Psychol Sci*

- 2016;**27**:419-27. doi:10.1177/0956797615627133.
35. Bhullar N, Schutte NS, Malouff JM. Associations of individualistic-collectivistic orientations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ental health,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Individ Differ Res* 2012;**10**:165-75.
36. Du H, Chen A, Chi P, King RB. Person-culture fit boosts national pride: a cross-cultural study among 78 societies. *J Res Pers* 2019;**81**:108-17. doi:10.1016/j.jrp.2019.05.008.
37. Ebert T, Berkessel JB, Jonsson T. Political person-culture match and longevity: the partisanship-mortality link depends on the cultural context. *Psychol Sci* 2023;**34**:1192-205. doi:10.1177/09567976231196145.
38. Fulmer CA, Gelfand MJ, Kruglanski AW, et al. On "feeling right" in cultural contexts: how person-culture match affects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 Sci* 2010;**21**:1563-9. doi:10.1177/0956797610384742.
39. Gebauer JE, Sedikides C, Schönbrodt FD, et al. The religiosity as social value hypothesis: a multi-method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across 65 countries and three levels of spatial aggregation. *J Pers Soc Psychol* 2017;**113**:e18-39. doi:10.1037/pspp0000104.
40. Kristof-Brown AL, Zimmerman RD, Johnson EC.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s' fit at work: a meta-analysis of person-job, person-organization, person-group, and person-supervisor fit. *Pers Psychol* 2005;**58**:281-342. doi:10.1111/j.1744-6570.2005.00672.x.
41. O'Reilly CA, Chatman J, Caldwell D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 profile comparison approach to assessi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MJ* 1991;**34**:487-516. doi:10.5465/256404.
42. Sörtheix FM, Lönnqvist JE. Person-group value congru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tudents from Argentina, Bulgaria and Finland: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 Community Appl Soc Psychol* 2015;**25**:34-48. doi:10.1002/casp.2193.
43. Rego A, Cunha MP. How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orientations predict happiness in a collectivistic context. *J Happiness Stud* 2009;**10**:19-35. doi:10.1007/s10902-007-9059-0.
44. Ogiwara Y, Uchida Y. Does individualism bring happiness? Nega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appiness. *Front Psychol* 2014;**5**:135. doi:10.3389/fpsyg.2014.00135.
45. Bellah RN, Madsen R, Sullivan WM, Swidler A, Tipton SM. *Habits of the Heart, With a New Preface: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46. Adams G, Estrada-Villalta S, Sullivan D, Markus HR. The psychology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neoliberalism of psychology. *J Soc Issues* 2019;**75**:189-216. doi:10.1111/josi.12305.
47. Becker JC, Hartwich L, Haslam SA. Neoliberalism can reduce well-being by promoting a sense of social disconnection, competition, and loneliness. *Br J Soc Psychol* 2021;**60**:947-65. doi:10.1111/bjso.12438.
48. Putnam R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49. Scott G, Ciarrochi J, Deane FP. Disadvantages of being an individualist in a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idiocentrism, emotional competenc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Aust Psychol* 2004;**39**:143-54. doi:10.1080/00050060410001701861.
50. Nezelek JB, Humphrey A.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well-being among a sample of emerging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merg Adulthood* 2023;**11**:520-4. doi:10.1177/21676968211054596.
51. Watson PJ, Morris RJ. Commun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ism: factors and correlations with values, social adjustment, and self-esteem. *J Psychol* 1994;**128**:289-97. doi:10.1080/00223980.1994.9712731.
52. 陸洛：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 2003；(20)：139-207。doi:10.6254/2003.20.139。
Lu L. Defining the self-other relation: the emergence of composite self. *Ben Tu Xin Li Xue Yan Jiu* 2003;(20):139-207. doi:10.6254/2003.20.139. [In Chinese: English abstract]
53. 張仁和、孫蒨如、葉光輝：華人本土自我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 2019；(51)：3-31。doi:10.6254/IPRCS.201906_(51).0001。
Chang JH, Sun CR, Yeh KH. A review of Chinese indigenous research on the self. *Ben Tu Xin Li Xue Yan Jiu* 2019;(51):3-31. doi:10.6254/IPRCS.201906_(51).0001. [In Chinese: English abstract]
54. Lu L. "Cultural fit":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discrepancies in values, belief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 Soc Psychol* 2006;**146**:203-21. doi:10.3200/SOCP.146.2.203-221.
55. Brewer MB.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91;**17**:475-82. doi:10.1177/0146167291175001.
56.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World Values Survey 2010-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Accessed October 1, 2023.
57. Hofstede G. *Values Survey Modules*. Available at: <https://geerthofstede.com/research-and-vsm/>

- dimension-data-matrix/. Accessed October 1, 2023.
58.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Data center: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vailable at: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 Accessed October 1, 2023.
 59. 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www.stat.gov.tw/. 引|用2023/10/01。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R.O.C. (Taiwan). National Statistics, R.O.C. (Taiwan).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gov.tw/>. Accessed October 1, 2023.
 60. Davern MT, Cummins RA, Stokes MA.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an affective-cognitive construct. *J Happiness Stud* 2007;**8**:429-49. doi:10.1007/s10902-007-9066-1.
 61. Levin J. Religion and positive well-being among Israeli and diaspora Jews: findings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Ment Health Relig Cult* 2012;**15**:709-20. doi:10.1080/13674676.2011.617002.
 62. Selim S.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in Turkey. *Soc Indic Res* 2008;**88**:531-62. doi:10.1007/s11205-007-9218-z.
 63. Schwartz SH, Melech G, Lehmann A, Burgess S, Harris M, Owens V. Extending the cross-cultural validity of the theory of basic human values with a different method of measurement. *J Cross Cult Psychol* 2001;**32**:519-42. doi:10.1177/0022022101032005001.
 64. Schwartz S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Zanna MP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1992; 1-65. doi:10.1016/S0065-2601(08)60281-6.
 65. Trapnell PD, Paulhus DL. Agentic and communal values: their scope and measurement. *J Pers Assess* 2012;**94**:39-52. doi:10.1080/00223891.2011.627968.
 66. Zhang X, Xing C, Guan Y, et al.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a matter of cultural values or personal values? *Psychol Aging* 2016;**31**:89-100. doi:10.1037/pag0000068.
 67. 陳端容、陸子初、吳冠穎：老人是珍寶或是負擔？亞洲青壯世代對老年人的態度。台灣衛誌 2022；**41**：331-46。doi:10.6288/TJPH.202206_41(3).111016。 Chen DR, Lu TC, Wu KY. Older adults: a treasure or a burden? Attitudes among Asian youth.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22;**41**:331-46. doi:10.6288/TJPH.202206_41(3).111016. [In Chinese: English abstract]
 68. Bernerth JB, Aguinis H. A critical review and best-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rol variable usage. *Pers Psychol* 2016;**69**:229-83. doi:10.1111/peps.12103.
 69. Sun S, Chen J, Johannesson M, Kind P, Burström K.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ubjective health status, age, sex, reg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study. *J Happiness Stud* 2016;**17**:833-73. doi:10.1007/s10902-014-9611-7.
 70. Tan JJX, Kraus MW, Carpenter NC, Adler 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 Bull* 2020;**146**:970-1020. doi:10.1037/bul0000258.
 71. Blanchflower DG. Is happiness U-shaped everywhere? Ag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145 countries. *J Popul Econ* 2021;**34**:575-624. doi:10.1007/s00148-020-00797-z.
 72. The R Foundation. R: a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r-project.org/>. Accessed October 1, 2023.
 73. Kuznetsova A, Brockhoff PB, Christensen RHB. lmerTest package: tests in Linear Mixed Effects Models. *J Stat Softw* 2017;**82**:1-26. doi:10.18637/jss.v082.i13.
 74. Raudenbush SW, Bryk AS, Cheong YF, Richard T, Congdon RT Jr. HLM 6: Hierarchical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ing. Skokie, IL: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2004.
 75. Enders CK, Tofighi D. Centering predictor variables in cross-sectional multilevel models: a new look at an old issue. *Psychol Methods* 2007;**12**:121-38. doi:10.1037/1082-989X.12.2.121.
 76. Kreft IGG, de Leeuw J, Aiken L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centering i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Multivariate Behav Res* 1995;**30**:1-21. doi:10.1207/s15327906mbr3001_1.
 77.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doi:10.4324/9780203771587.
 78. Bauer DJ, Curran PJ. Probing interactions in fixed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inferential and graphical techniques. *Multivariate Behav Res* 2005;**40**:373-400. doi:10.1207/s15327906mbr4003_5.
 79. Holt-Lunstad J. Why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for physical health: a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modifying risk and protection. *Annu Rev Psychol* 2018;**69**:437-58. doi:10.1146/annurev-psych-122216-011902.
 80. Ryan RM, La Guardia JG, Solky-Butzel J, Chirkov V, Kim Y. On the interpersonal regulation of emotions: emotional reliance across gender,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es. *Pers Relatsh* 2005;**12**:145-63. doi:10.1111/j.1350-4126.2005.00106.x.

81. Hamamura T. Are cultures becoming individualistic? A cross-temporal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ers Soc Psychol Rev* 2012;**16**:3-24. doi:10.1177/1088868311411587.
82. Diener E, Emmons RA, Larsen RJ, Griffin 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 Pers Assess* 1985;**49**:71-5. doi:10.1207/s15327752jpa4901_13.
83. Watson D, Clark 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 Pers Soc Psychol* 1988;**54**:1063-70. doi:10.1037/0022-3514.54.6.1063.
84. Ryan RM, Deci E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 Rev Psychol* 2001;**52**:141-66. doi:10.1146/annurev.psych.52.1.141.
85. Ryff CD.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Pers Soc Psychol* 1989;**57**:1069-81. doi:10.1037/0022-3514.57.6.1069.
86. Kitayama S, Uskul AK. Culture, mind, and the brain: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 Rev Psychol* 2011;**62**:419-49. doi:10.1146/annurev-psych-120709-145357.

Intersection of values and well-being: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sonal values,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YI-HONG LIN¹, YI-CHUNG HSU^{2,*}, MEI-HUA WU³, MENG-LING HE³, DUAN-RUNG CHEN⁴

Objectives: Predi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vary across cultures.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d on personal value orientation, analyzing how culture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Methods:** Integrating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data from the sixth wave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e us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to analyze 40,195 responses from 31 countries. How the effects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vary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dimensions was visualized. **Results:** Agency and commun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significant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both effects. The results of cross-level interaction analyses do 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a "value assimilation benefit" but rather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a "value complementary benefi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gency on well-being is stronger in countries with a stronger cultural emphasis on collectivism, restrained societal norms, and acceptance of power inequality. Moreover, agency may even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well-being in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culture of indulgence. **Conclusions:** Subjective well-being may be enhanced by developing personal value orientations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collective culture rather than by assimilating mainstream cultural values. Policy makers promoting well-being should consider individuals' value orientation within cultural contexts and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understand both the emphasized and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ir culture and accept value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llective mainstream.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24;**43**(3):280-299)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 values,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¹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²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129, Sec. 3, Sanmin Rd., North Dist., Taichung, Taiwan, R.O.C.

³ Institute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⁴ Institute of Health Behaviors and Community Sciences,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 Correspondence author E-mail: hsuyichung@yahoo.com.tw

Received: Apr 1, 2024 Accepted: Jun 24, 2024

[https://doi.org/10.6288/TJPH.202406_43\(3\).113022](https://doi.org/10.6288/TJPH.202406_43(3).113022)